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傅璇琮
卷

当代学者
自选文库



傅璇琮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傅璇琮著.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12

ISBN 7-5336-2161-1

I. 当… II. 傅… III. 傅璇琮-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40781 号

责任编辑:唐元明

装帧设计:黄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插页:1

印 张:22.75

字 数:500 000

版 次: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 000

定 价:2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 2651321

邮 编:230061

出版说明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数千年的生成、拓展、吸纳、融合和嬗变，熔铸了一座座巍峨耸立的学术丰碑，汇聚了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可谓光耀千古，泽被万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的条件、氛围大有改善，此间虽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当代学者们依然凭其不屈的人文精神，孜孜矻矻，勉力奋耕，创造出了不少无愧于历史的高质量学术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学界更如春际的原野，生机勃勃，满目葱茏，佳花异卉，令人流连，真正迎来了思想解放、学术繁荣的难得盛景。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学术精华，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尽自己些微的心力，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使中华民族的学术之薪、智慧之火，燃烧更旺，烛照更久远！

鉴此，我社郑重推出这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本套书选收我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著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中的重要章节，旨在总结和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本研究之精华、学术繁荣之盛况，使优良的学术传统、严整的学术规范得以承传光大，使一代学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以新的面貌进入 21 世纪以至更远的时代。

为能更好地反映每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风貌，我们特请作者自选文稿，撰写自序、自传和主要著作目录，力求使读者能够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学者们的学术世界，领略其学术精义，了解其研究方法，感受其思想和文字的魅力。

梁任公有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我们深信，当代学术将以其特有的底蕴、卓然的风采广为流布，嘉惠学林，裨益于后世。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

自序

承安徽教育出版社盛意，把我的有关论著列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之中，这对我实是不虞之誉，真如在最近接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由王元化先生任名誉主编的一套四大厚册新书《释中国》，选录本世纪初至90年代约一百十余位学者的学术研究论文，其中有我《进士试与社会风气》，把我这篇文章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陈寅恪《论韩愈》等名著并列，实感汗颜。

我曾不止一次说过，80年代以来，我虽然写了一些书，但总是想为学术界做些实事。我真正做研究工作，并非在大学或研究机构，而是在出版社。我自1958年由北大进入中华书局，一直没有离开过编辑部。编辑工作确实有所谓“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味道，但真正投入者会有大学、研究机构所不易具备的求实、广学、高效三者兼备的机能。这之中最主要的是求实。我曾说过，我所写的几本专著，以及所编的几部资料和索引，自问都有为后来者铺路的性质：“我希望多做一些实在的事，这不但在自己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在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中，我总也力求组织一些切实有用的书稿，使我们的学术工作有一个丰厚的基础。”（《〈唐诗论学丛稿〉后记》）

我于1951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1952年秋高校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合并，我改入北大。1955年毕业后留校做浦江清先生讲授的宋元明清文学史助教，自以为从此可以在教学、科研上坦途前进，不料1958年初，因所谓办“同人刊物”，与乐黛云、褚斌杰、裴斐、金开诚等一起被打成右派集团，我即于1958年3月被贬出至商务印书馆，同年7月又至中华书局。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告诫我：要在工作中好好改造。他在延安时曾与范文澜一起编写过《中国通史简编》，知道爱惜人才，因此并不安排我去下放劳动，而是把我圈在书稿中，一会儿交我经顾颉刚先生校点过的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叫我写一篇出版说明，一会儿把北大中文系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交我审读。我那时还不过二十五六岁，就上自《诗经》，下至黄遵宪《人境庐集外诗》，忙个不停。我那时天真地立下一个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专业编辑。

按照我当时的政治处境，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于是我白天审读、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书。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我提议，由中华书局搞一套“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同意这一方案，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后来又相继组约《陶渊明卷》、《陆游卷》，及编辑部自己编纂的《李白卷》、《杜甫卷》，我自己就搞《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杨万里范成大卷》。我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则到府右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我的近二十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和七十余万字

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点。我没有荒废时间。

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这些年来，我确实也受到学界友人的鼓励和赞许。如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先生为我的《唐诗论学丛稿》作序，说“《唐代诗人丛考》出版时，我们刚摆脱古典文学研究的单调浅薄的模式不久，这部著作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1998年第4期《文学遗产》有董乃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三位“关于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陈尚君说：“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的出版，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受陈寅恪、岑仲勉治唐史的影响，追求广泛、全面地占有文献，在考订中注意分别史料的主次源流。”赵昌平则认为近二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有更深更广的开掘”，这就是“史科学带上了文化学意义，傅璇琮先生的考证，就是借鉴了丹纳关于地域文化和诗人群体的艺术理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蒋寅研究员在评陈尚君、陶敏所作的《唐才子传校笺补正》时说：“傅璇琮先生对学科建设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从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直有计划地组织领导着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活动，他对唐代文学学科建设所作的贡献，应该说要超过实际获得的荣誉。”（《书品》1996年第3期）

我不是想借他人的话来作自我宣扬，上面说过，我是想为我们的编辑同行争气。我是一个编辑，编辑当然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审读稿件，把住质量，开阔视野，组织选题，但同时还要

提高本身的文化素质和学术修养,尽可能使自己在某一专业领域发展。学术研究与审读书稿,是互为影响,互补互长的。中国的出版社,与外国一些纯粹商业店家不同,它还带有一定文化学术机构性质。我曾说过,回顾本世纪的出版史,凡是能在历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当时是赚钱或赔钱,它们总有两大特点,一是出好书,一是出人才。我们一提起过去的商务,总会自然想起张元济、沈雁冰、郑振铎、傅东华;一说起开明,就会想起夏丏尊、叶圣陶、徐调孚、周振甫。50年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有冯雪峰、周绍良、顾学颉、王利器、舒芜;而中华书局五六十年代则有张政烺、陈乃乾、宋云彬、杨伯峻、傅振伦、马非百、王仲闻。出版社要具备文化学术意识,就得在编辑部门中有专门家、学者,他们可以不受某种潮流的冲激,甘心于为文化学术事业而执着一生。

列为本书第一篇的《高明的卒年》,就是我在工作中得到重要线索作出的。大约1960—1961年间,我负责审读孔凡礼先生的《陆游卷》资料,他所辑集的资料中有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高明、余尧臣《题〈晨起〉诗卷》两文。他是作为后人对陆游《晨起》诗的评论而辑的,但我在阅稿过程中却注意到高明(则诚)这篇文章是过去有关其诗文辑集的材料中未曾见的,这也算是对其佚文的补辑,尤其是余尧臣的一篇,其中说高明作这篇题记为元至正十三年,越六年即病逝于四明(今浙江宁波)。我由此考出高明的卒年在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这离明代建国即洪武元年(1368)还有九年,而过去的记载,从明代的《南词叙录》、《留青日札》、《闲中古今录》,至现代人著作,包括一些文学史书,都说这位《琵琶记》的作者曾应明太祖朱元璋之召

征修元史,后以老病辞归。这在过去差不多已成定论。

我这篇文章刊于当时中华书局刚创办的《文史》杂志第一期(1962年)。刊出后曾为一些文学史论著所引用,但也遭到驳难。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这一说法近几年来已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杭州大学的徐朔方先生和中山大学的黄仕中先生都赞成此说,并进一步补充了论据。去年黄仕中先生把他的新著《琵琶记的研究》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寄赠给我,书中关于高则诚的卒年还专设一章加以考辨。我并不是专门研究戏曲的,但高则诚卒年的考定应当说是这些年来戏曲史研究一个不小的创获,而就我说来却是于无意中得之的,得益于编辑的阅稿工作。这就是说,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而且有时所得还要超过这所“嫁”之“衣”。

本书所收文共三十四篇,大致是按写作的时间先后编排的,但其间也考虑到有些文章内容相近,为便于读者查考,虽时间先后不一,仍排列在一起。这样,大致分为七组。第一组共两篇,除上述的《高明的卒年》外,还有《〈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重印后记》,算是我在“文革”前60年代初治学的反映。这篇后记中有录自《永乐大典》的杨万里之子杨长孺所作《石湖词跋》一文,其中述及杨、范的交谊及南宋当时人对范成大词的评论,是他处少见的,自我录出后,我见到已为一些文章所引用,这也使我感到欣慰。

第二组共五篇,主要是有关《唐代诗人丛考》之文。这里选录《李嘉祐考》一文,对大历时期作家群作了整体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当时南北诗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群,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那就是钱起、卢纶、韩翃等大历十才子诗人,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呈献当时的达官贵人。一是以江东吴越为中心,那就是

……刘长卿、李嘉祐等人，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风景山水。当然，这其间也有交错，如卢纶、司空曙也写过南方景色，皇甫冉、严维也曾在洛阳做过官。但据诗歌史的材料，大致可以分为这两大群，两个地区，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有所不同”。这样做也是作家群研究的一种尝试，后来有些评论者对此给予肯定。扬州大学于1995年10月曾举办过一次“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也论及我的这一说法，认为“他的工作给群体研究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文学史面貌的揭示带来转机”（《扬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第三组，从时间上是接着《唐代诗人丛考》来的。我于1978年11月写成《唐代诗人丛考》自序，接着我想作中晚唐研究，但感到中晚唐就文献材料来说，较初盛唐复杂得多，其间有不少作品真伪需要清理，不能如前期那样可以一个一个作家分别考述。因此我与友人合作，索性对整个唐五代的人物作一个综合性的传记索引。我们收辑了八十三种唐宋人的著作，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编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多万字的大书：《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我的这篇万余字的序言写于1980年6月，除了论述全书体例外，还对所辑的八十三种史书作了介绍，可以视为简要的唐代文献史料概述。接着我就作《李德裕年谱》，我在此书的序言中曾说：“牛李党争中，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学的复杂情况，需要从牛李党争的角度加以说明，而要研究牛李党争，最直接的办法则是研究李德裕。”当时我作《李德裕年谱》，确是冒一定风险的，因为李德裕主要还是历史人物，他的一生牵涉到不少政治活动，而我又不是专门治唐史的，何况牛李党争又甚为复杂，因党争之故而造成晚唐史实的真伪更使不少人头痛。但我当时还是立志于作

成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年谱，自序中引了法国作家雨果的一句话：“艺术就是一种勇气。”真正的学术研究，同艺术创作一样，是需要探索 and 创新的勇气的，当然，这还需要下真工夫作冷静、细致的史料考辨。这方面占用了我不少时间，我差不多整整两年，除了《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外，没有写过别的东西。我很感谢罗宗强先生对我这一工作的评论：“在对纷纭繁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辨是非的充满感情的审视。这其实已经超出一般谱录的编写范围，而是一种历史的整体审视了。”（《唐诗论学丛稿》序）我在作完年谱之后，曾想对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作系统的整理，但苦于没有时间，十年之后，才与安庆师院周建国同志合作，于近年完成《李德裕文集校笺》，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希望，作这部校笺，不只是对李德裕的著作作一次历史性的清理，而是想通过我们的工作，表示在当前古籍整理出版上如何体现真正下工夫以出精品的要求。

限于篇幅，我就不可能对所收文章详作介绍了，只能概而言之，好在本书的附录载有两位年轻博士刘石和张仲谋同志的文章，他们出于对当今学术发展的研究来评我的治学思路，也可以见出八九十年代年青研究者与过去不同的鲜明风格与特异文采。

第四组是有关唐代科举与文学的文章，我是想通过科举来了解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第五组四篇文章，论述闻一多、陈寅恪、朱东润三位前辈学者的治学特点。第六组，主要考索唐代特有的诗论著作体式《诗格》及唐人选唐诗。我于1996年出版一部《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是想对

50年代出版的《唐人选唐诗（十种）》作较大的更新。

最后一组则是几篇序言和后记。80年代以来，我曾应学术友人之囑，为他们的著作写了一些序言。我曾说过：“本来，我是服膺于‘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这两句话的，但在目前我们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觉得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也实在是一种相濡以沫。在这些序中，我也表示了对某些学术问题的看法。”这些序，大部分已收于我的另外两部书中，即《唐诗论学丛稿》与《濡沫集》，这里所收的是两书未收的近年之作。最后两篇，是我近几年来从事的两个大选题，一是以“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为基础提出中国文学编年通史的设想（关于这一点，苏州大学文学院潘树广教授最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文学研究导论》中还提到：“傅璇琮倡导的‘文学编年史的研究’更为全面，从最阔大的视野考察一时代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二是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周发祥先生合作，编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立足于世界的范围来研究中国文学本身的价值及对外传播（此书已陆续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总之，我总是希望，在学术研究中，一要求实，二要创新，并力求出原创性的作品，这样才能真正在历史上站得住脚。

最后，我要感谢责编唐元明同志，他在审稿、看校样的每一环节中，都能全力投入，认真细致，我的书稿中过去未及改正的排校错误，这次也由他提出，加以更正。

1998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高明的卒年	1
《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重印后记	5
《唐代诗人丛考》余论	11
刘长卿事迹考辨	21
李嘉祐考	56
卢纶考	76
王昌龄事迹新探	105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前言	131
《李德裕年谱》自序	158
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170
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	193

论唐代进士的出身及唐代科举取士中

寒士与子弟之争·····	217
《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	239
唐代进士放榜与宴集·····	248
唐代举子情状与科场风习·····	287

闻一多与唐诗研究····· 342

一种文化史的批评

——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	362
陈寅恪思想的几点探讨·····	385
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	
——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	417

天宝诗风的演变····· 432

谈王昌龄的《诗格》

——一部有争议的书·····	452
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	479
唐人选唐诗题记·····	516
点校本《五代诗话》序·····	558

《唐才子传校笺》编余随札····· 577

《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前记····· 588

《唐诗论学丛稿》后记····· 592

陈振藻《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序····· 598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序····· 605

《日晷丛书》总序····· 615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	619
文学编年史的设想·····	624
唐初三十年的文学流程·····	631
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的启示·····	653
[附一]	
实学研究与文化探索	
——傅璇琮先生的学术思想 ·····	刘 石 674
[附二]	
试论文学的批评方法	
——读傅璇琮先生《唐诗论学丛稿》 ·····	张仲谋 692
作者小传·····	710
主要著作目录·····	711

高明的卒年

《琵琶记》作者高明（则诚）的卒年向无定说。钱南扬同志在《琵琶记作者高明传》^①中，从苏伯衡生年推测高明生于大德五年（1301），说其卒当在七十以上。戴不凡同志的《论古典名剧琵琶记》一书^②，据王昶《明词综》卷一高明小传：“洪武初召修元史，以老病辞归”，谓其歿当在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以后。这些都是揣测之辞。

清代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收高明的《题（陆游）晨起诗卷》^③，文云：

陆务观诗，大概学杜少陵，间多爱君忧时之语。如《题侠客图》所谓“无奈和戎白面郎”，《示儿作》所谓“但悲不见九州同”，《壮士歌》所谓“胡不来归汉天子”，其雄心壮气可想见已。此诗意高语健，不以衰老自弃，而欲尚友古人，不以蒿莱廊庙异趣，而所贵者道，则其平生所志，又非徒屑屑于事功者。或者乃以韩平原《南园记》为放翁病，岂知《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事业，初无谗辞，庸何伤！夫放翁不受世俗衰，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耶？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